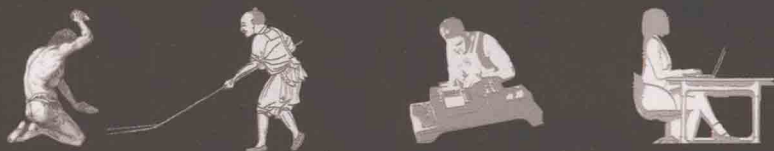


The History Of Work

工作的历史

我们常常抱怨我们工作得太难、太累、太压抑，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工作的实质。
我们的社会不可能回到伊甸园时代，但工作可以成为一种享受，为了自己，我们也要为之而努力。
这本书写的是有史以来贯穿于人类社会中的活动，写的是工作，是工作组织和工作观念。
但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写的是人。



(英)理查德·唐金 著 谢仲伟 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The History Of Work
工作的历史

(英)理查德·唐金 著 谢仲伟 译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 BEIJING

The History of Work by Richard Donkin

Copyright © 2010 by Richard Donkin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The History of Work by Richard Donkin.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s have asserted their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本书简体中文版专有出版权由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公司授予电子工业出版社。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01-2011-2408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工作的历史/(英)唐金(Donkin, R.)著;谢仲伟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8

书名原文: The History of Work

ISBN 978-7-121-14079-2

I. ①工… II. ①唐… ②谢… III. ①工作—历史—世界 IV. ①C913.2-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6754 号

责任编辑:李影 曹磊

印刷:北京机工印刷厂

装订:三河市鹏成印业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 100036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22.5 字数:380 千字

印次: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ts@phei.com.cn, 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 88258888。

前言

PREFACE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这本书都堪称巨著。它应该出现在所有管理和组织领域的领袖和学者的书架上，而且，这是一本值得精读的书。书内讲述的故事极具启发性，书中提出的问题很深刻，而它所得出的结论，则推翻了许多我们认为很神圣的假设。

理查德·唐金（Richard Donkin），一名杰出的记者、出色的人类社会观察者，将运用其独特的天赋，带领读者在广阔的历史范畴里进行一段独特的旅程。关于这一点，我想先做一下强调：因为我确信，当代社会组织的秘密之一，便是管理者的“反历史性”。工作的本质一直都在变化。曾经，这种变化是循序渐进的；而如今，这种变化的速度已经呈现出惊人的态势。2500年前，赫拉克利特发现“唯有变化才是永恒”时，还没有办法验证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如果一个管理者不能理解变化对我们人类产生的影响，那么他们塑造变化，利用变化的能力是可以直接忽略的。对于管理理论而言，历史的确是最重要的实验室，而作者为我们打开了这个实验室的门，引领我们感受一场非凡的变化之旅。

唐金指出，当我们人类从繁重的手工劳动桎梏中解放出来而进入工业时代之际，我们已经变成了“工作的奴隶”。摆脱手工劳作的这种“解放”，很讽刺地让人和工作的关系陷入另外一种新的、或许也是更麻烦的束缚。“我们的生命因为工

作而窒息”，他这样写道，“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呢？”在接下来的几百页文字里，他开始很巧妙地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他发现，我们对于工作概念的理解，相对于现实情况，已经滞后了几十年。事实上，我们对工作概念过时的理解，还基于过去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悠久的神学理念和神学文化所推崇的工作方式增强了这种理解。但实际上，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已不再采用那种工作方式了。

作者从科学、社会学、神学等方面对工作的发展进程进行了一次百科全书式的探究。所有关于工作的细节都在这里被发掘出来：我们远古的祖先所采用的最初的工作方式；现代工作模式的发展；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祝福”与“诅咒”；农奴制度、奴隶制度、儿童剥削，当然，还有崭新的、令人目眩的计算机时代，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我所谓的“信息爆炸焦虑”。

在这个追寻历史的过程中，作者最关注的焦点就是：他想将每一个读者分离开，分别与之角力。在分析了工作的来源并预见了工作的未来之后，他劝诫我们寻找一种新的路径来思考工作的本质，并思考我们该如何衡量和回报工作。他问道：我们可以像古希腊理想中的那样，在一种理想的模式中开发我们全部的潜能吗？我们可以使男人和女人避免成为社会变更和科技发展的受害者吗？我们可以帮助那些在单调的工作中耗尽生命，甚至遗忘了工作更高层次价值的人们吗？

除了这些心灵层面的问题，我发现自己近些年一直在劝告管理者和学者，有许多关于工作的特别问题急需得到解答。这些问题包括：未来最理想的组织形式是小型的、摇摆不定的个体族群，还是大型的联盟状态？对于最终被众多组织认同的、所谓“高参与性”和“自我管理”的价值，会有其局限性吗？我们作为社会成员的共性与个体天赋的差异性之间有何关联？一度被人珍视的雇佣者和受雇者之间的社会契约结局如何？我们拥有，或者我们需要一种组织变更的理论支持吗？还有，我们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我相信，关于上述问题，唐金的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思考。

最重要的是，这本书所引领的时空穿行，让我们感知了我们自己生活的重要性。尼科斯·卡赞扎基（Nikos Kazantzakis）在《一生的总结》（Repoty Htrvo）里提到过一句古老的谚语：“我诅咒你生活在一个重要的时代。”的确，我们被这个时代所诅咒，压力重重。但是因为这种诅咒，我们又是光鲜的、精神振奋的。这是一

个怎样的时代啊！唐金带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个时代，对于他，任何称赞都不算过誉。

沃伦·本尼斯 (Warren Bennis)

美国南加州大学商业管理学著名教授

致谢

THANKS

我要向许多人表达我的谢意，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们给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金融时报》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给我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也提供了大量的建议。特别的谢意送给佩德罗·达斯·古普塔（pedro Das Gupta）、彼得·奇克（Peter Cheek）、尼尔·麦克唐纳（Neil McDonald）、巴夫那加尔·帕特尔（Bhavna Patel）、大卫·斯那顿（David Snaddon）和菲利普·鲍威尔（Philip Powell）。《金融时报》日本分社的松谷美津子（Mitsuko Matsutani）、秋崎信子（Nobuko Juji）和保罗·亚伯拉罕（Paul Arahams）保证了我在日本调查部分的顺畅。同样诚挚的谢意送给《金融时报》伦敦分社的杰基·哈尔（Jackie Hare），她的耐心、辛勤工作和作为朋友与同事的理解，让我受益匪浅。当然，《金融时报》的其他同事，我也要感谢你们。特别要感谢马丁·尼尔森（Martin Neilson）、波尼·弗林（bernie Flynn）、海伦·蒂姆波森（Helen Timpson）和西莉亚·克拉克（Celia Clack）；理查德·兰伯特（Richard Lambert），谢谢你允许我离开；约翰·瑞丁（John Ridding），谢谢你带我回来。普瑞迪·基赛（Pradeep Jethi），感谢你在出版市场方面给我的深刻的建议。

英国铁桥峡博物馆基金的副会长大卫·德·汉（David de Haan），感谢你百忙之中抽时间为我讲解迪拜王朝；新拉纳克保护基金会的洛娜·截维森（Lorna Davidson），感谢你跟我分享有关罗伯特·欧文的深刻见解。彼得·斯塔伯克（Peter Star-

buck)，或许是全英国对彼得·德鲁克的生活和工作最了解的人，谢谢你为我提供了更宽泛的信息。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金融时报》的专业编辑，谢谢你帮我验证了许多专业信息来源的可靠性。Board-level 临时管理委员会的马丁·伍德（Martin Wood），谢谢你为我讲解有关“过渡公司”的历史及其重要性。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和约瑟夫·朱兰（Joseph Juran），感谢你们抽出时间跟我分享你们的个人心得。斯蒂芬·布林克霍恩（Stephen Blinkhorn）和罗伯特·麦克亨利（Robert McHenry），谢谢你们为我提供了有关心理测试的用处及限制的明确规定。来自合益管理咨询公司的克里斯·戴森（Chris Dyson）、莱克西·梅尔泽（Lex Melzer）和罗塞尔·赫比（Russell Hobby），谢谢你们允许我研究你们比较私密的工作能力测评和高管薪酬。来自韬睿顾问公司的艾瑞克·杜弗伦（Eric Duffelen）和邓肯·布朗（Duncan Brown），谢谢你们为我提供薪酬领域的专业知识。感谢英国特许人事和发展协会的杰夫·阿姆斯特朗（Geoff Armstrong）和你的同事们为我提供贯穿全程的帮助。大不列颠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最诚挚的谢意送给你们，谢谢你们提供的全世界最好的调查服务。我还要感谢：英国铁桥峡博物馆的埃尔顿爵士藏区，位于绿野村的福特汽车博物馆，芝加哥历史协会，华盛顿新和谐图书馆，伦敦维也纳图书馆，日耳曼历史协会，伯利恒图书馆和沃金图书馆。

威尔·霍珀（Will Hopper）和肯尼斯·霍珀（Kenneth Hopper），谢谢你们从自己的项目里抽出时间来，在美国和日本科学管理方式的发展上，你们对日本的管理模式研究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丽兹·安·博登（Liz Ann Borden）和休·托伦斯（Hugh Torrens），谢谢你们抽时间为我讲述玛丽·安宁的故事。朗讯科技的档案管理员，谢谢你跟我分享了许多关于美国工程师的珍贵资料，这帮我重新认识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管理规则。松下雅治（Masaharu Matsushita）抽时间为我勾画了他对民间交流研讨会的记忆，而东海大学唐津肇（Hajime Karatsu）教授则将他的 NBC 广播公司的重要资料《日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If Japan Can Why Can't We）借给了我，谢谢你们。北出谷弘（Yoshihiro Kitadeya），在我对松下电器的调研中提供了鼎力帮助。我还要感谢大卫·厄德尔（David Erdal），他跟我分享了关于意大利合作工作方式的观点；感谢曼彻斯特大学的大卫·希尔（David Hill）教授为我讲解“尤利乌斯工作日程法”的背景；感谢巴里·阿尔法教授（Barry Alpha）、蒂莫西·波特姆（Timothy Bottoms）、杰瑞·米什恩（Jerry Mission）和沃尔·诺瑞斯（Vol Norris），是你们让我去科瓦尼阿玛（Kowan-yama）（澳大利亚城市，编者注）的旅程愉快且不虚此行。约翰·罗德（John Lord），

一个碎石机行业的专家，为我们与新石器时代建立了活生生的关联；还有马克·罗伯特（Mark Roberts），他很高兴地为我重现了博克斯格罗夫（Boxgrove）的惊人发现。

我要特别感谢 3Com 号轮船的管理者齐·布莱斯（Chay Blyth）、大卫·汤姆金森（David Tomkinson）和他们的公司，还有所有跟我同船的 3Com 号的船员，你们给了我一次终生难忘的航行，也激发了我关于此书的许多想法。很多有价值的灵感和支持来自克莱尔·尼尔（Clare Neal），在我暂别职业生涯时，她帮我理清了有关工作的纷繁事务。

温暖的谢意送给丹尼斯·科尔康门斯（Dennis Kilcommons），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还是我的老朋友，他的关于卢德运动的广博知识为本书增色不少。菲利普·法尔（Philippe Falle），我的另一个好朋友，同时还是一名杰出的摄影师，他曾经忍受着疲惫甚至折磨陪我在冬天的时候去波兰东部调研，如果没有他，我肯定不可能完成这“不可能的任务”。我要尤其感谢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他帮助我了解了世界出版市场的拜占庭部分。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吉莉安，感谢她的鼓励和理解，还有她在阅读我的手稿时的细心的支持；还要感谢我的孩子们，约翰、罗伯特和乔治，谢谢你们一直都在我的身边。

理查德·唐金
(Richard Donkin)

引言

PREFACE

我的祖母是个强势的女人，她对工作价值的判断十分坚定。当我的父亲从钢铁厂回到家里的时候，她会说：“给干活儿的人把道让开！”此时，我的父亲穿着蓝色的工作服，戴着布帽子，一个背包耷拉在他的肩头。相比父亲所得到的英雄般的礼遇，祖母对我在学校的努力表现出轻蔑的态度。她总是坚持说：“你们受教育的时间太长了，还得指望那些工人。”我明白她的意思。成群的蓝领工人们从工厂大门鱼贯而出的景象，对她来说是一种坚定而且生活有保证的象征。工厂长鸣的汽笛声和不会中断的打卡机，是一种秩序和生活延续性的保证。

从1945年到1975年，我父亲一直在同一家钢铁厂做电焊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从战场上回来，想要回到自己以前的工作岗位，结果他发现一个年轻的女人穿着工作服，做着他以前做的工作。后来，他娶了她，她也欣然地回归家庭，执掌起一个家庭主妇应该负责的烦琐的家务劳动。

钢铁厂很脏，很冷，也很吵闹。父亲的整个成年时代几乎都在那里工作。毫无疑问，他始终做着类似的事情。他有时候上白班，有时候上夜班。时间并不是什么问题，暗淡的自然光会透过尘迹斑驳的天窗照进来。

二战之后，他的主要工作是给渔船的货仓焊制角形托座，好让船员们区分各自的捕获物。这份工作是计件付薪的，每个角架的固定单价根据理性范围内单个员工

完成一件产品的预估时间来定。父亲是个熟手，后来他说：“那份工作让我赚了很多钱。”后来他转去建造金属大梁，要在保证承重力的前提下减少梁架的含钢量。有时候工作环境太热，他的防护罩就像是水桶一样承接着他的汗水。

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儿，他们给她取名为珍妮特。有一次，他们少有地去海边远足，那时候珍妮特刚四岁。在那里，她感染了小儿麻痹症。这个病令她的一条腿萎缩，脊柱严重侧弯，并使一侧肺功能衰竭。我的父母没有车，所以照管和抚养一个残疾的女儿以及两个调皮捣蛋的儿子，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我看来，他们从不觉得艰难。家里从未有过解雇或裁员的谈话，我们的家庭就在这样的焦虑下相对自由地生活着。

这是二战之后的一段几乎全民就业的黄金时代。事态的改变出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父亲此时已经退休，英国北部的“烟囱工业”受到了巨大冲击。炼钢厂关闭了，格里姆斯比拖网渔船厂破产、废弃继而被出售。那些伟大的工业——纺织业、钢铁业、造船业、煤矿业，所有英国工业革命的中坚力量，都开始崩塌。很多曾经排队领工资的人们，从没听说过失业的存在，但现在世面临着失业。

那时候祖母已经过世了。她在自己的坟墓里毫不畏惧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她以前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还得指望那些工人”，此刻读来既没什么意义，又显得很空洞。我们都知道“工人”指的是谁。他们是那些工厂里的巨大群体，是工会组织下的蓝领劳动力。英国的《金融时报》是最早意识到这个群体能量的报纸，每日劳工版面上有争论激烈的故事，有薪酬概况，也有贸易联盟的新闻。1987年我进入这家报纸的时候，有六名记者负责劳工版的报道，专注于满足这个群体的需求。如今，报纸甚至都没有专门的短讯版留给劳工群体，取而代之的是商业和职业版。因为我们都知道，劳工这个群体在三十年前就已经消失了。男女工人从工厂门口汹涌而出的潮流变成了涓涓细流，曾经的一大群人排队的场面像幽灵一样消失在电脑、机器人主控的产品线和自动化控制的工厂里。

我们工作的方式正发生着变化，这变化远比由放松管制和调节劳资关系的立法所引起的变化来得更为深刻。就某些层面来讲，祖母的话也没有错——毕竟人们还在工作，有些事情也还需要人来完成——即使就她所理解的工作的概念而言，一切都不同了。

曾经，我们所理解的工作的概念就是能为我们获得报酬的事情。现在，我们也在做着事情，但是区分我们做的事情和使我们获得报酬的事情之间的界限，却不

那么清晰了。有时候，判定我们所做的事情里哪些属于工作的范畴，并不太容易；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在许多工作之间转换，弄得自己不知所措。以前，我们可以把工作置之脑后。现在，我们随身携带着工作——在我们的移动存储器里，在我们的笔记本电脑里。我们的工作生涯繁复交错，渗透在我们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过去的十五年里，这就是我的工作状态。我写所有关于招募的内容（招聘、猎头和职业能力测试），写鼓励人们工作的内容（加薪、升职、激励、津贴、认同感），还写人们被迫离开原来职位的内容（缩小规模、裁员、解聘和再就业辅导）。写得越多，我就越忍不住反问自己：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工作？或者退一步，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工作？每当我面对“为什么”的题目时，我的反应都是回头寻找最初的规则——不管最初的规则在哪儿。这并不是个轻松的题目。工作甚至比人类本身的历史更为久远，当我们远古的祖先们劳动的时候，工作已经出现在一定的组织模式中了。

如今，大家大概都觉得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有些人会说工作是一种心理诉求。许多人都主张：他们工作的唯一理由不过是为了生活。那么，什么是生活呢？有一个定义是：一份充足的收入，可以保障住房、衣食、供养不受福利制度覆盖的家人。但是西方工业国家中产阶级的平均收入所能提供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这个定义的要求。所以，我们工作或许是为了在某些领域寻求进步，让我们的孩子和我们自己过得更好。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获取收入的工作之外，我们还喜欢收拾花园、洗车、装饰房子、整理床铺，甚至在社区里做志愿者。这里面有的工作是为了保持房屋的整洁有序，但还有些或许更应该被称为生活方式的延展。有些情况下，这些工作或许可以满足我们对认同感、尊严的内在需求，这些感受不太可能从获取收入的工作中得到。很明显，我们选择工作有着千差万别的理由。我们所做的工作，换个方向看的话，即便大都是日常的重复和既定程序（经常看不到什么伟大的信念），却依然在帮助这个世界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在上世纪后五十年中逐渐长大，人们坚信所有伟大的科技进步——机器人、计算机、互联网、硅片——都会节约劳动，从而让我们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如今，我们不那么确定了。就像是高速公路创造了更多交通流量一样，新科技创造了更多的新工业，也诞生了更多的新工作。看起来我们可以宽泛地说，“进步”和工作之间存在着指数级的关系。

在二十世纪的初始阶段，这看起来的确是好事。因为在既定的生产结构和以工厂为基础的制造业内，更多的工作也就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那个时候，随着人类健康水平的提高以及可靠的、被广泛接受的避孕措施的缺失，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工作机会的增多，则恰好应对了人口数量增多对工作的大量需求。但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不仅见证了传统生产结构的土崩瓦解，也见证了人们对于工作概念的颠覆——颠覆了过去二、三百年以来我们对工作的简单定义。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改变的趋势更为明显。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离岸劳动力及进口劳动力与日俱增，许多工作朝着更为商品化的方向迈进。

这种变化引发了一种观点：在新的世纪里，计算机和互联网令我们的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和工业革命或者几千年前的农业革命一样深刻。

当学院派们还在争论工作体系变化的各种证据时，有关“工作的流失正在加快还是弹性工作的确是在显著增长”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在西方社会，人群很明显地被分为“有”和“无”两个大的群体。但这里的“有”和“无”，并不是简单的穷与富，或者就业与失业的对比。美国正在见证那些工作的穷人，辛劳之后却无法获得支撑生活的稳定收入。同时，那些著名的大公司的老板们，却赚取着五百倍于他们底层员工的收入。财富的二次分配，看来并没有流向下游，反而呈现出所谓的“上溯效应”。

更令人不解的事情则在于，那些获得高收入的个体，耗费了如此多的时间在工作上，他们甚至没有机会脱离自己的工作去享受短暂的闲暇时光。曾经，我们的生命里有一些可以自由选择休闲时光，但一旦这样的时刻变得神圣和珍贵起来，工作场所的新的交流方式就侵占了它们。现在更常见的事情是，休闲已经不可能和工作完全分开了。我曾经和金融时报指数有限公司（FTSE）的老板坐在河边钓鱼——这也是工作，不过被穿上了休闲的外衣。我一边垂钓，一边听他在手机里向手下下达指示。站在他旁边的是一个苏格兰“吉列”（Ghillie），他是被土地拥有人雇来照看河流和帮助钓鱼客的。“吉列”在盖尔语里面是仆人的意思，但在这条河上，“吉列”是大公司老板的主人。

离开熟悉的工作环境，这位老板很乐于扮演“学徒”的角色。这种角色的变化很微妙，也很重要。我们必须承认，在不同的环境下，我们会拥有不同的身份。在芬兰，学生们会教他们的老师电脑知识。在新的职场环境中，职权因知识而来，但知识却会散布于整个社会范围。这不是富人或者特权阶层专有的禁地。

工作已经掌控了工薪阶层的生活，甚至让他们失去了娱乐的能力。整个世界好像被划分成两个群体——有钱休闲的人没有时间，有时间休闲的人却没有钱。

人们当然还有自己的运动休闲方式。但如今工薪阶层的人们休闲的时候，却经常将他们的休闲时光浓缩为“休闲快餐”。一度持续整晚的聚会现在被缩短为两个小时的鸡尾酒会。同时，“工作快餐”闯入休闲时段，人们不断接打手机，就像是球赛中场人们拿着手机讨论下注一样。无论如何，我们所拥有的大块时间在如今“效率制胜”的社会里，逐渐缩短来适应我们不断缩水的眼界。

在威尔斯（H. G. Wells）的《时光机器》（The Time Machine）一书中，他虚构了一个未来的社会。在那里不同的人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路径。一群人是秉持享乐主义的贵族和寻欢者，他们最后变成了像孩子一样天真和纯洁的人，威尔斯称他们为艾洛伊族（Eloi）。另一群人则是劳动者和机械师，是从事手工劳作的下层人，他们最后沦为同类相食的穴居者，生活在下界的黑暗和噪声之中，威尔斯称他们是莫洛克斯族（Morlocks）。其实威尔斯没什么好担心的，现在困厄的劳动者就像是濒临灭绝的蓝鲸一样稀有了。

不过，贵族也没能坚持下来，中产阶级占领了地球。这个阶级成功地融合了莫洛克斯族的勤勉和艾洛伊族的教养。他们对于工作的独立程度，就像是奶牛对土地的独立程度一样。唯一的不同在于，奶牛是被赶到土地上去的，而工作则是人们的主动选择。并且，是我们自己关上了背后的那扇门，我们成了自愿的囚犯。就像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囚笼”，我们在消费为主的物质社会里，自愿、理性地成为囚徒。^①

在新世纪伊始，当我们坐在每天上下班的客车上，穿着我们的套装，读着每日的报纸，拿着自己的手提箱，对名利贪得无厌地追逐的时候，这些类似穴居者的特性，是否开始侵蚀快乐的根源了呢？游吟诗人戴维斯（W. H. Davies）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如此可怜地生活，战战兢兢。我们没有时间凝视和站定。”

几年前，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朱丽叶特·肖尔（Juliet Schor）在为自己的书《过度劳累的美国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做调查时发现，在1992年之前的二十年内，美国每人每年的平均工作时间增加了一个月。美国人选择了金钱，放

^①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Work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Routledge，1992年，181页。此书第一版出版于1930年。

弃了时间。^① 有些证据显示，我们对工作方式的选择，走到了十分错误的方向。英国皇家艺术、制造和商业促进学会甚至发布了名为《重新定义工作》（Redefining Work）的报告，号召从根本上扭转人们对传统工作模式的背弃。^②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工作的方式不仅需要新的定义，更需要新的理解。这不仅对于我们个体十分重要，对于那些雇佣我们的人来说也有非凡的意义。现在有一些把人看成财产的说法。是这样吗？难道我们是活生生的会呼吸的财产？难道我们是被公司或社会机构诱捕甚至作茧自缚的个人收入创造者吗？

管理学作家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曾设想过一种自由组合的社会形态。那时候人们都以自由职业者的形态存在，他们通过工作相互连接，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模式。这看起来好像是一种符合逻辑的选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专长，但不管是演员还是自由撰稿人，自由组合的形态不会在他们需要申请按揭时提供相应的支持。

那些自由职业者只有在提供了长达几年的持续工作证明后，才可能拥有与那些所谓“永久性工作”的人同样的资质，以获取信用机构的贷款。我们工作模式的基础设施建设显然没有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并给临时性和短期工作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压力。

即使朝九晚五的工作理念依旧根深蒂固，科技的进步允许越来越多的人自己选择工作地点。其实，工作的概念依然维持着过时的定义。“居家工作”的说法与那些将家庭跟休闲和家庭事务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似乎发生了抵触，就好像对于通勤族来说，时间和空间的转换、工作与家庭之间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即便是那些打破了心理界限的“居家工作者”，依然需要与外界和他人进行沟通。

对于很多人来说，由信息科技编织的自由美梦并未实现。如影随形的沟通需求和互联网让他们无处遁形。语音信箱、电子邮件、黑莓手机和即时消息甚至让人无法专心工作。

在信息社会里，有些工作是无形的。员工为工作问题所进行的“思考”，老板该如何报偿？这种“思考”不算工作吗？办公室的闲谈聊天有时候甚至比工作备忘

^①朱丽叶特·肖尔（Juliet Schor），《过度劳累的美国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Basic Books，1992年。这种断言基于1969-1987年间的劳动力统计数据。

^②瓦莱丽·贝利斯（Valerie Bayliss），《重新定义工作》（Redefining Work），1998年，英国皇家艺术、制造和商业促进学会。

录更有效率，这算不算工作呢？

我们急需一套新的工作伦理学，彻底打破工作与休闲的传统两分法。体育明星可以通过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赚取高薪，老板们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工作可以是有趣的，而且他们有责任将工作变得有趣。就像英国的零售商约翰·路易斯一样，他把员工的幸福感当成管理的首要任务。

关键就在这里。工作可以是压力重重的、令人疲惫的、无趣的、痛苦的，但它也可以很有趣。所以，当我们在工作中感到乐趣时，应该有罪恶感吗？或许不该有，但我们的确觉得这样不对。因为西方社会受新教工作伦理的影响很深，几百年来，人们都认为工作是一种艰苦的劳动，是我们不想做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因为工作可以带来救赎，完成一项工作是一种美德。这种工作伦理对工作进行分类、定义后，将它变得清清楚楚。新教工作伦理认为工作本身就具有意义，而且创造工作是很有益的。

挑战新教工作伦理，就是一种异端——特别是在美国。如果你敢提倡休闲或者问出“我们为什么要工作”之类的问题，会有人投来轻蔑的目光，好像你很不负责任似的。在新教工作伦理定义的世界里，只有两种人——勤劳的人和懒惰的人。我们也知道有些人的懒惰是自己的选择，但这种主动选择就是一种罪恶。

但是那些工作了，却徒劳无功或方向错误或造成毁灭性破坏的人又该如何评判呢？比如终其一生在错误的假设上奋斗的科学家，设计出丑陋建筑的建筑师，破坏了热带雨林的伐木工人和在毫无意义的战争中夺人性命的军人。

还有那些工作付诸流水的人们。比如创意不被采用的设计师，作品未能出版的作家和绝望中自毁作品的画家。其中有一些可以解读为是为未来的伟大作品做准备，但其他的呢？美国艺术家麦克尼尔·惠斯勒（McNeill Whistler）曾提醒一位艺术批评家，他是在为别人“积累一生的知识”付费。但在这个只重视机会的社会里，很多人的努力都虚掷了。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世界上已经没有劳工阶层了，好像我们都是中产阶级似的。但是，最近在英国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将自己定位为“劳工阶层”^①。当我们的生活被工作主宰了的时候，这样的结果根本不足为奇。现在的双职工家庭

①《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1998年9月26日。BBC组织了一项调查，参与人数为1178人，其中55%的人认为自己是劳工阶层，41%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只有1%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上流社会。

里，夫妇都努力工作，就为了支付孩子读私立学校的学费、保姆费、雇人修整草坪的费用、小时工整理房间的费用。我们的工作已经失去了平衡，扰乱了我们的生活。

人们迫切地想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寻找一份平衡，但政府和企业对员工的挣扎熟视无睹。社会保障架构依然建立在“有业”和“无业”的二分基础之上，贫穷依然是无所不在的问题，不是那种食不果腹、忍饥受冻的贫穷，而是富人的贫穷。我们的生活因工作而窒息，究竟是如何变成这个样子的呢？

这本书旨在以历史的视角讨论工作的演进历程，从远古到现在，兼及各个时期重要的里程碑事件。书内将涉及原始社会、奴隶制度、行会制度、商业秘密的形成和宗教对工作的影响，还会探讨伟大的贵格派（Quaker）企业家的人本主义理想以及管理专家 F. W. 泰勒、马克斯·韦伯、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玛丽·帕克·芙丽特（Mary Parker Follet）、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和 W. 爱德华兹·戴明（W. Edwards Deming）等人的理论。这本书将回望我们的过去，也会展望我们的未来。最后，在我们对工作的期望和工作在我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上，这本书还会给出一些建议。